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在党的旗帜下”全军文学征文作品选登

张维忠 书

党在我心中

□胡 可

我对党的认识，是在参加革命工作以后一步步加深的。

在上世纪30年代，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以左翼文艺的熏陶，开始仰慕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我投奔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并在不久后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此前对党的认识是抽象的。在游击队里，见到了北平地下党的同志和从监狱里解救出来的老党员；游击队编入八路军以后，又接触到许多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同志，他们都是立志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中国革命事业的人。我对党的认识，就和这许多使我终生敬慕的个人联结起来而具体化了。

我的青年时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这个伟大的集体当中度过的。我逐渐理解：在对敌作战中，在困难的环境中，党的每一项任务都要由执行任务的党组织来保证；党支部要起核心作用、堡垒作用，党员要起模范作用、骨干作用；在作战中，干部要身先士卒，党员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要“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受到挫折，群众情绪低落时，党员要善于做解释鼓动工作；危急情况下党员要挺身而出，要有牺牲精神。回想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刚懂得一点革命的道理就自视不凡，其实是幼稚浮躁的表现。成为八路军的宣传员和创作人员以后，在跟随部队行动，在同与敌人拼杀搏斗的勇士们相处的时候，在和交公粮、抬担架、做军鞋的父老乡亲们相处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渺小。懂得革命的道理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我还十分欠缺还需要不断学习；但作为党员，首先要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来完成党交付的任务。

那个时候，我们这些投身革命的年轻知识分子，在斗争中，在党的教育下很自然萌生出献身革命事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想法，却往往担心自己的条件不够，或担心因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而未提出申请。有的同志在临终时才作为遗愿提出，有的同志是牺牲后才在衣袋里发现入党申请书。那个时候，人们要求入党是争取承担艰巨任务，争取作出更多的牺牲，把申请入党作为庄严的誓言来看待。今天不同了。我们党已经处于执政的地位，为了贯彻党的路线，许多岗位由共产党员负责。责任大了，权力也大了，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权力可以为人民做好事，也可以以权谋私，作威作福。在和平年代，追求入党已不像战争年代那样抱有把一切献给党的奉献牺牲精神。有些人就是为了“入党好办事”，把入党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而有的负责同志又把入党看做一项待遇，随便把党员称号赠送给不够入党条件的人，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使广大正直的党员心怀忧虑，使反腐倡廉、端正党风成为党的一项长期艰巨任务。

今天我已经是一个老年人。作为战争的幸存者，我时常想起经历过的往事，时常想起牺牲的同志、文艺工作岗位上的战友和跟随部队行动时共过患难的知心朋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没有看到新中国的成立，有的同志甚至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说过的话我还时常记起。我也常想起战争年代照顾过我、掩护过我、嘱咐过我，对我寄予希望的老大伯、老大娘，我也曾多次向他们作过承诺，作为党员，我是属于他们的。

在战争年代，在严酷的斗争中，入党誓词中有一句话叫“永不叛党”。因为那时共产党员有可能被捕、被俘，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面前，共产党员应做到坚贞不屈，维护党的利益。今天被捕、被俘的事不多了，因此这些话也不怎么提了。但在腐朽生活的引诱面前，在各种利欲、各种诱惑、各种价值观的包围当中，我们的同志还要不要考虑、要不要遵守“永不叛党”的誓言呢？

我对党的认识，随着对党的历史的不断了解而加深。党走过的历史道路，是与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引下对中国社会不断加深的认识相伴随的，是在斗争实践的检验下不断修正自身认识的偏差中曲折前行的。“四·一二”政变的教训使党认识到中国革命中武装斗争的重要，开始创立工农红军；城市暴动道路的失败，使党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必须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方针；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产生的各种腐朽思想带到党内对革命造成的危害，使党认识到党的建设的重要和整顿党风的必要。整风运动带来党内思想的一致，带来了全党的团结和战争的胜利。党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为了取得正确的认识，取得今天的胜利，革命前辈们曾付出了怎样惨重的代价啊！

党的整风运动，又一次提高了我对党的认识，认识到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的极端重要。我们党的90年历程，是在不断战胜各种困难，不断深化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不断纠正自身的失误中成熟起来，而成为伟大的党的。

认识到的东西将不会失去。

我离休多年，接触外界不多，对许多新的事物不熟悉，所以多是往事。往事难忘，道路曲折，但信念从未动摇。相信有党在，有党的三大作风在，社会主义事业总会向前发展。“人间正道是沧桑”，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尽管我此生见不到，她一定会实现。

父亲的入党介绍人

□卢江林

每一个共产党员，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我的父亲卢来发，1929年1月参加红军，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他的连队指导员邱结成。后来，这个同志下落不明。解放后，父亲曾于1950年、1954年、1985年三次查找，在烈士名单中没有查到他，在江西安远的老红军名单中也没有查到他。

1994年，父亲患结肠癌做了一次大手术。他也许估计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病床前向我讲了他的入党介绍人邱结成的故事。

我的故乡是江西安远，参加革命前家里是赤贫。我6岁丧父，跟着母亲要过饭，8岁给人放牛，13岁给地主当长工，16岁当挑夫。

1929年1月29日，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来到赣南，到了我们安远县的鹤子圩。毛委员给安远县委写了一封指示信，要求县委组织地方开展武装斗争，举行暴动，配合红军攻打安远县城。

早在大革命时期，安远就有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1928年初，赣南特委派罗贵波同志到安远发展党组织，建立安远县委，罗贵波为书记，杜承项、杜隆奎为常委。邱结成是他们在安远发展最早的那批党员之一。

县委接到毛委员的指示信后，立即派一名同志向毛委员、朱军长报告敌情。毛委员、朱军长了解了敌情的变化，放弃了攻打安远县城的计划，带领红四军向寻邬(原名长宁，现名寻乌)方向转移。

与此同时，县委决定按照毛委员的指示，在安远城东的仰天湖地区成立红军安远县游击大队。仰天湖位于三百山的北麓，在崇山峻岭之中，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由于此前我已经受到过共产党员旺富国、卢革新等同志的宣传，所以第一批报名参加红军。在仰天湖我第一次认识了邱结成，他当时是一个小队长。游击大队开始只有几十个人，后来发展到几百人。

1929年7月，成立刚刚半年的安远游击大队就扩编为红23纵队，由谢育山担任纵队长，杜隆奎担任政委。我在纵队部担任通讯员。邱结成任中队的副指导员，负责共青团的工作。

参加红军不久，我就向杜政委表达过入党的愿望。1930年3月，红23纵队到达江西乐安，杜政委让邱结成找我谈话，他指出我的优点是作战勇敢，工作积极，缺点是不爱学习，对党的知识了解不够。组织上决定先吸收我加入共青团。他告诉我，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同时也是一所培养共产党员的学校。他希望我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在这所学校里迅速成长。就这样，经邱结成同志介绍，我成了一名共青团员。

1930年7月下旬，红23纵队奉命开往江西信丰参加整编。由赣南的7个红军纵队合编成红22军，军长为陈毅，副军长为罗贵波。邱结成在连队担任指导员，我在军部担任通信班长，后来当了排长。

1930年10月，陈军长率领红22军主力北上吉安，配合红一军团主力参加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罗贵波副军长带一个团的兵力留守赣南。我和邱结成同志随罗副军长留了下来。留在赣南的部队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打土豪分田地，并继续以红22军的名义扩大红军。

这一年的11月，邱结成指导员主持支部大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邱指导员在介绍我时说，卢来发入团8个月来，在战斗中英勇杀敌，表现突出，而且认真克服缺点，进步很快，不仅当了班长，还当了排长。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吸收我加入共产党。我参加红军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党的教育下不断地在战斗中成长，由一个大字不识、没有阶级觉悟的贫苦农民的儿子，由一个从小讨饭长大的长工和挑夫，成为有一定先进觉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为我选择的这条革命道路感到自豪和骄傲，也特别感谢邱结成指导员对我的帮助教育。

由于红22军留守部队在赣南广泛开展游击活动，信丰、南康、安远、寻邬等县都组建了红军地方武装、游击队和赤卫队，到1930年年底，将这些红军地方武装正式编成红35军，罗贵波任军长。邱结成同志在红309团一连当指导员，我在一连当排长。

红35军组建不久，就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在富田战斗中，红35军担负迂回包抄的任务。当天下午，我连奉命向固陂发起进攻，邱结成指导员冲在最前面，带领连队一举攻入敌第28师兵站，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当天晚上，红35军又攻入富田，与红三军、红四军会师，共歼敌一个师和一个旅。

在战斗中，我一方面向连长学习如何指挥打仗，一方面向邱指导员学习如何做政治工作。我看到行军时连长总是走在最前面，因为他要决定行军路线，把握行军的速度，处理遇到的敌情；而邱指导员总是走在队伍中间，掌握战士们的思想情绪，做好政治工作。作战时，连长一般在指挥位置上，便于掌握全局；而邱指导员总是出现在担负最重要任务、战斗最激烈的班排，冲锋时他总是在队伍的最前面，充分体现了我军政治工作的表率作用。

1931年7月底，我和邱结成同志一起被调往红七军第56团。

红七军是在邓小平等同志领导百色起义后创建的一支英雄部队，经过千里转战到达中央苏区，编入红三军团序列。为改善红七军千里转战严重减员的状况，红军总司令部决定，从中央苏区各部队中抽调一批战斗骨干充实红七军。上级命令邱结成指导员带着我和一个班的战士补充到红七军56团三营九连，邱结成任九连指导员，我则改任班长。

我们调入九连不到三天，立即随部队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战斗。

8月4日，敌军分多路向兴国以北的高兴圩地域进攻，我军主力被压缩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形势十分危急。一方面军临时总前方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和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决定，在多路进攻的敌军中，先打较弱的一路，即进至莲塘、良村一带的敌第47师和第54师。8月5日夜，红七军随红一方面军主力从两股敌军之间的空隙中向东穿插。上级要求我们，行军中不许说话，不许咳嗽，行军锅一律用被子包裹。几万大军的夜间行动，几乎做到悄然无声。一夜之间红军主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8月6日，红军主力进至莲塘地区。红56团奉命迂回到蜈溪水口，切断敌第47师第2旅的退路，与其他红军部队一起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第二天拂晓，红军各部队向被围敌军发起猛攻。我红9连由东向西冲入敌阵，与敌展开肉搏战。邱结成指导员刚到9连没几天，许多战士还没来得及认识，更谈不上做思想工作。但是战斗一打响，指导员第一个端着刺刀冲上去，这就是无声的命令，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政治工作。经三个小时激战，红军全歼了敌第2旅，击毙旅长谭子钧。在这次白刃战中，邱结成指导员身负重伤，被担架抬了下去。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上级给9连派来了新的指导员，我也被任命为9连的1排长，而邱结成指导员从此没有再回来。当时我也打听过，有的说他到医院没抢救过来，牺牲了；也有的说，命是救活了，伤残以后交地方了。没有得到一个确实的消息。

一年以后，上级任命我当了9连指导员。我当指导员后的第一仗，就是参加第四次反“围剿”的蛟湖战斗，围歼敌军第154旅。我想起邱结成指导员的榜样，在拼刺刀的时候第一个冲上去。9连官兵见指导员冲上去了，也马上跟了上去，个个奋勇向前，刺刀见红，杀出了威风。这次战斗红七军与红一军团一起，全歼了敌第154旅主力。

后来，红56团整编为红三军团5师13团，在“东方军”入闽作战中屡建战功，被授予“英雄模范团”荣誉称号，我本人也在9连指导员的岗位上受到战斗奖励一次。在第五次反“围剿”的高虎脑、万年亭战斗中，红13团3营坚守主阵地，打得英勇顽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上都有记载。在高虎脑战斗结束以后18天，当时的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就在《高虎脑战斗的政治工作》一文中，点名表扬了9连的战场政治工作。尽管邱结成同志只在9连当了几天指导员，但他用鲜血和生命播下的种子，为9连的政治工作开创了一个优良的传统。

听父亲讲了邱结成指导员的故事，我非常感动。父亲说，邱结成同志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他如果活着，一定不会离开革命队伍，如果牺牲了，烈士名单总该有他啊。查不到他的下落，我心有不甘，心有不甘啊！

为了帮助父亲了结心愿，我决心继续帮他查下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江西省安远县高云山乡的烈士名单中，查到了一个“邱古铖”。我向父亲报告的时候，他眼睛一亮，说，这个很像，邱结成好像就是高云山那一带的人。而且那时我不识字，并不知道他名字是哪几个字。“邱结成”与“邱古铖”用我们老家话发音差不多。

我告诉父亲，现有的档案记载，邱古铖烈士1929年2月参加红军，1931年6月牺牲。其他都查不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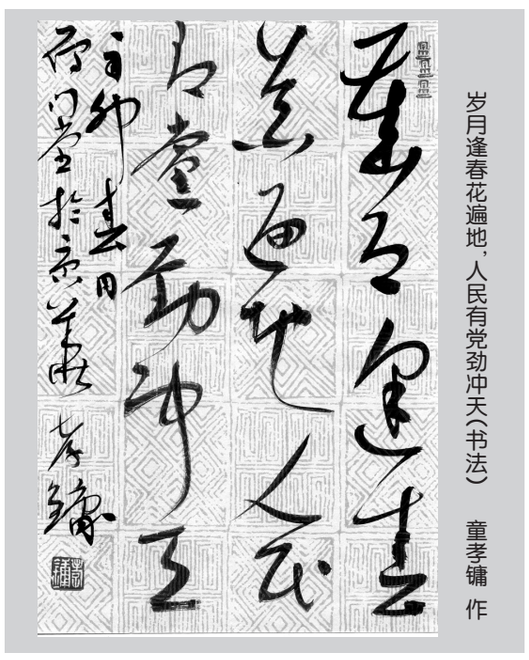
父亲说，参军的时间对。毛委员、朱军长是1929年1月29日到安远，县委接到毛委员来信指示后开始组建安远游击大队，第一批报名参军的人就是在1月底2月初。牺牲的时间不对。红七军是1931年7月下旬才到达中央苏区，如果他6月就牺牲了，就不可能到红56团3营9连去当指导员了。

我说，过去人们习惯用农历。邱结成指导员是1931年8月6日在莲塘战斗中负伤的，我查了一下，这一天是农历六月二十三日。

父亲口中喃喃道，有可能，有可能。

他手捧着那本《安远县志》，轻轻抚摸着那一串长长的烈士英名录。那个名单共有2181人。

父亲于1998年1月3日去世。我在此之前帮他查到了邱古铖烈士的情况，尽管还不能肯定一定就是父亲的入党介绍人，但总算帮他了了一个心愿。



岁月逢春花遍地，人民有党劲冲天（书法） 童孝镛 作

婆婆的党龄

□马晓丽

电话里婆婆的声音极度不满：“你怎么把我的入党时间写到1943年了？我是1942年入的党！”我脑袋里嗡的一声，心想这下完了，搞错什么我也不该把婆婆的党龄给搞错啊。

婆婆是组织上的人，她几乎是我见过的最看重组织、最信赖组织的人了。组织这个词是婆婆在生活中使用得最频繁，也是婆婆认为最管用的一个词。赞成你的时候婆婆会说，对了，组织上就是这样要求的；指责你的时候婆婆也会把组织搬出来，说组织上不会允许你这样做的。明明是自己花钱请来的小保姆，婆婆也要一本正经地教导人家说，组织上分配你到我这里来工作，你就要把工作做好，要对组织上负责！甚至跟儿子拌嘴，婆婆都会动用组织，说，别以为我说不过你就没人管你了，还有组织呢，不行我就去找组织上反映你！

这几天婆婆一直在看我写的《阅读父亲》，几乎每天都能从中挑出瑕疵，每天都会在电话里向我发出各种质询，我已经快要崩溃了。赶紧翻书查看，上面果然写着我婆婆是1943年入党。我历来自认为是个很严肃、很尊重事实的作家，既然我白纸黑字地这样写下了，肯定就是有出处的。找了半天，果然找到了出处——我公公的履历表。在我公公亲手填写的这张履历表上，我婆婆入党时间那一栏里清清楚楚地写着：1943年。问题到底出在哪了呢？我明白，不管问题出在哪，这件事必须搞清楚。难，想跟我婆婆搞清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真难。婆婆快90岁了，记忆在婆婆这个年纪就像是个玩捉迷藏的顽皮孩子，时而会冒出个清晰的头给你，但当你想捉住它仔细辨认时，它却转身跑开，消失得无影无踪。何况婆婆从来都不会顺着一个话题讲到底，总是讲着讲着就岔到一边去了，死活都拉不回来。

我问婆婆是在哪里入党的？婆婆竟然一连说出了三个不同的单位：山东抗大一分校、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宣传队和115师战士剧社。婆婆说她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是在哪里入党的了，但却突然说，我有三个入党介绍人呢。我问为什么是三个？入党不都是两个介绍人吗？婆婆说，我出身不好，是地主，所以得三个人介绍。我很吃惊，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规矩。看到我那副少见多怪的样子，婆婆的脸上浮现出老资格的得意。婆婆说，不光得三个人介绍入党，预备期也比别人都长呢。我问，一起入党预备期还不一样长吗？婆婆说，当然不一样，贫雇农出身就没有预备期，中农是三个月预备期，富农是半年，地主是一年。

1938年，正在中学读书的婆婆受到学校里中共地下党的影响，决心参加革命。这个地主家的二小姐，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用力移开顶门的粗木杠，偷偷溜出家门，走上了革命道路。那一年，婆婆15岁。婆婆的革命道路似乎并不顺利，刚到革命队伍后不久，婆婆就开始接受审查，因为党内开始抓托派分子，由于把婆婆那一批学生带出来参加革命的地下党人被怀疑是“托匪”，婆婆受到牵连。审查婆婆时，一听人家问她是不是“托匪”，婆婆就哭了。婆婆哭着说，我才不是土匪呢，我家有房子有地为啥要当土匪啊……见这个小姑娘连“托匪”、土匪都搞不清楚，一副泪水涟涟的委屈模样，负责审查的人就说，算了算了，把她送回去吧。婆婆就回去了，但带她出来参加革命的那个地下党人却再也没能回去。大概在那之后，婆婆被送到山东抗大一分校学习。婆婆对这里有入党的记忆，是因为婆婆就是从这时开始积极争取入党的。起初，婆婆不被组织接受，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她表现得不好，也不是因为她的家庭出身不好，而是因为她曾被审查过，是有托派嫌疑的人。婆婆因此在各方面都分外努力，结果当上了班长，还当上了优秀班长。婆婆清楚地记得，组织上在这时就已经准备接受她入党了。但婆婆是不是在这时入党的呢？从抗大一分校毕业之后，婆婆就记不清自己是到了陇海南进支队宣传队，还是到了115师战士剧社。这两个单位工作性质太相近，婆婆的记忆在这里就变得格外模糊。婆婆忽然把话题岔到了一边，讲起自己的眼睛曾经被演出用的炸药炸出了血。当时大家以为她的眼睛肯定瞎了，都唏嘘不已，说那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眼睛瞎了真可惜。婆婆后来被送到了一个女医生那里治疗。那女医生是部队首长的妻子，婆婆在女医生那里住了好长时间，女医生每天用盐水给婆婆洗眼睛，竟然把婆婆的眼睛给洗好了。我赶紧帮助婆婆回忆，把婆婆往回“拉”。我问婆婆记不记得那女医生是哪位首长的妻子，只要婆婆记得，我就能查出婆婆当时是在哪个部队。可能是曾国华吧？要不就是梁兴初？婆婆目光迷茫地看着我，随后坚定地摇摇头说，不知道，我想不起来了。

没办法，我只好转而问婆婆的入党介绍人都是谁。婆婆说出了三个名字。我问婆婆后来跟他们还有联系吗？婆婆说早就失去联系了，战争年代没法保持联系。婆婆的眼神儿忽然有些黯淡，说后来那个女的入党介绍人在大扫荡时被敌人抓住了，结果当了叛徒。我问婆婆鬼子大扫荡那么残酷，她有没有遇到过危险？婆婆说有，说她有一次差点就被鬼子给抓住了。那次婆婆和另外一个女兵躲在老乡家的床底下，眼睁睁地看着鬼子的马靴在眼前晃来晃去。鬼子把这家的大嫂拖到院子里打骂，逼她说出八路的下落。婆婆躲在床底下心急如焚地听着敌人的怒骂和大嫂的喊叫，她们不能出去，如果暴露，不仅她们完了，大嫂全家也完了。婆婆只能紧紧地攥着手枪，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就在这时，大嫂那个五六岁的儿子突然跑进来，冲着床底下小声喊：“八路姑姑”，“八路姑姑”。他大概是想叫八路姑姑去救自己的妈妈。婆婆情急之下，一把把这个孩子拖了进来，赶紧捂住了他的嘴巴……好在敌人很快就走了，大嫂忍着痛把她们叫出来，只说了句，你们快走吧。我听着婆婆的讲述，仿佛是在看一场红色电影。不知为什么，婆婆亲身经历过的那些事，拿到今天的背景下来放映，竟会显得太过离奇，显得如虚构般不真实了。

大扫荡的回忆终于使婆婆记起了什么，婆婆突然说，要不我就在抗大入党了，结果敌人开始大扫荡，我们赶紧转移，我入党的事只好搁下，大扫荡之后就没机会了，我们这批抗大学员都毕业分到部队。这就对了，婆婆不是在抗大学习期间入的党。如此推算，婆婆也不是在陇海南进支队宣传队入党的。南进支队宣传队应该是婆婆参加革命后进入的第一支队伍，婆婆就是在那时被当做托派嫌疑接受审查，也是在那时被炸伤眼睛。这就清楚了，婆婆应该是在眼伤治好之后，被送到抗大一分校学习，从抗大毕业之后，婆婆就去了115师战士剧社。也就是说，婆婆肯定是在战士剧社入的党。

婆婆对此不置可否，她大概实在是想不清楚。但婆婆却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党小组会。婆婆说，她参加的第一次党小组会是钻进庄稼地里开的。我问为什么，婆婆说保密呀，那时在革命队伍里党的活动也是秘密的，谁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发展党员也都是秘密发展。婆婆就是在参加党小组会之后，才知道自己身边哪些人是共产党员的。我问为什么在革命队伍内部还保密，婆婆说当时情况复杂，如果暴露了身份，万一碰到特殊情况怎么办？万一有人叛变了怎么办？我明白了，婆婆说的没错，如果婆婆是在战士剧社入的党，那就应该是在1942年。因为1943年初婆婆就与公公蔡正国结婚，跟随公公的部队去胶东了。那时，公公是115师教导二旅的参谋长，刚被任命为改编后的教导二团团长，即山东八路军抗大第三分校校长。婆婆说，他们结婚时买了一毛钱的花生请大家吃。我不知道婆婆说的一毛钱是什么钱，也不知道这一毛钱到底买了多少花生，只知道他们结婚两天后，公公立刻就带部队出发赴任去了。那以后的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部队一直在马不停蹄地奔走，他们穿越了敌人的封锁线，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冲出了敌人的大扫荡。婆婆就在这样危险的不断奔波的日子里度过了她的新婚蜜月，也度过了她的入党预备期。

现在我知道了，婆婆是在1942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在1943年成为正式党员的。婆婆记住的是自己成为预备党员的日期，而公公记下的是婆婆成为正式党员的日期。我不知道当年的党龄应该怎么计算，不知道那时预备期算不算党龄，但我宁愿算，因为我知道婆婆很在意。我知道婆婆这一生中失去了太多的东西，先是在敌人的追杀下失去了她的女儿，又在解放战争中失去了孕育中的孩子，接着在朝鲜战场上失去了她的丈夫，随后又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她的大儿子，而对组织上的信任和依赖几乎已经成了婆婆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了。

我结婚的时候，婆婆的身份已经由一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一个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了的副军长的遗孀，变成了一个没有工作、没有职务、没有收入的家庭妇女。公公牺牲后，婆婆在组织的关照下改嫁他人，但却一直没再参加工作，因为组织把婆婆的档案给丢失了。也想过恢复档案，但从战争年代一路走来，婆婆与很多证明人都失去了联系，有的已经牺牲，有的是下落不明。没有档案就没法安排工作，没有工作婆婆就没有经济来源，只能靠继任丈夫的收入生活。尽管如此，婆婆对组织却没有丝毫的怨言。只是在每月交党费时，婆婆才会现出一些尴尬。婆婆曾在私下里对我说，你看我每个月交5分钱的党费，还得伸出手来跟别人要。我看到婆婆在说这话时，眼圈有些红，我以为婆婆会流下眼泪，但婆婆却立即就掩饰过去了。

婆婆从不抱怨组织，无论在什么样的处境下，婆婆都始终坚持按时交纳党费，积极参加组织活动。惟一一次听出婆婆有点意见，是因为换支部的事。婆婆晚年后在组织的关心下解决了待遇问题，以离休干部的身份住进了干休所，婆婆因此一直在老干部支部参加组织活动。忽然有一天干休所通知婆婆，说让她今后到家属支部去参加活动。不知道干休所为什么做这样的安排，也许是因为人员替换，他们已经不记得婆婆本身就是离休干部，认为婆婆只是个家属；也许他们虽然记得，但总觉得婆婆这样一个没身份的老太太混在那些有职务的离休干部中间不合适；也许他们压根儿就没把这样的调整当回事儿。但婆婆当回事儿，婆婆的神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显得很落寞。过去，婆婆一直因为自己是以离休干部的身份独立进入干休所而自豪，没想到一下子就被划到了家属里面，顷刻间就把她仅存的那一点点优越感消解掉了。但婆婆很快就又振作起来了，再提起这件事时，婆婆只说是自己当时没能及时向组织上反映情况，现在的这个结果是要怪自己的。

我正在跟婆婆探讨着她的党龄问题，婆婆却突然转向孙女说，你得积极争取入党啊。孙女漫不经心地抬头看了奶奶一眼，什么也没说。婆婆急了，说，奶奶告诉你，不入党找对象你都会被人瞧不起！孙女忽然笑了。我也憋不住笑了。婆婆看着我俩，张开缺牙的嘴也跟着笑了。看着婆婆那苍老的笑容，我在心里暗暗地想，等这本书再版的时候，我一定要把婆婆的党龄改过来！一定！